

丛书主编 戚俊杰 刘玉明

勿忘甲午



甲午日谍秘史

戚其章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甲午日谍秘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戚其章/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JIA WU RI DIE MI 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日谍秘史/戚其章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9

(勿忘甲午)

ISBN 7-80696-090-2

I. 甲... II. 戚... III. 间谍—情报活动—研究—
日本—1871~1894 IV. D7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964 号

勿忘甲午丛书

甲午日谍秘史

戚其章/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威海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套)

ISBN7-80696-090-2
全套(九册)定价:126.00 元

序 一

1894年,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是年,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

200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由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发起组织编著的“勿忘甲午”丛书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者、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博工作者,我们为能够参与其事,为倡发学界诸家新论、弘扬英烈爱国精神、普及海洋海防观念尽一份绵薄之力,深感欣慰和庆幸。

如果追溯我们编著“勿忘甲午”丛书的初衷与主旨,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勿忘甲午,是因为甲午战争是当时远东乃至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使远东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后的日俄战争、日德对山东的争夺、日美在太平洋的较量等等,无不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

勿忘甲午,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继《南京条约》以降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影响;从此以后,日本则逐步吞并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加紧侵略中国;同时也加快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

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勿忘甲午,是因为这场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借鉴:国家落后、政治腐败,就要遭人侵略、受人欺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强化和更新海权观念,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思想;中国只有继续发扬不甘示弱的奋发图强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才能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等等,都是我们的宝贵借鉴。

勿忘甲午,就要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中国不是百年前的中国,日本也不是百年前的日本,世界更不是百年前的世界。甲午硝烟早已消逝,甲午英魂彪炳史册,军国主义为世所不齿。历史洪流滚滚向前,中国人民洗雪了饱受侵略与欺凌的百年屈辱,但我们必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警惕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借尸还魂。

勿忘甲午,就要将甲午战败的耻辱,作为省察中华民族的一面镜子;就要把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就要激励后来之人心系祖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本书自酝酿构思以至成书,历时四年,正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然其得以问世,与戚其章先生的无私厚爱和不吝赐教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戚其章先生为史界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著名学者,尤其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著作等身,是该领域所公认的擎旗之人。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关心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早在四年之前,戚其章先生就倡议:应在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之际,推出一部内容全面、形式新颖、体裁独特、自成体系的甲午战争史学术专著。编著计划正式运作后,戚先生始终致力不辍,亲自参与丛书的规划构思,廓清问题,构筑框架,筛选题目,编著分工,悉心擘画,功不可没。更为可贵的是,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

自执笔撰著了本丛书之《甲午日谍秘史》分册。从而填补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丛书得以编成,还得益于其所依托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该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和适于其孕育成长的学术土壤。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是以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遗址性博物馆,是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专门的管理保护机构,馆址就设在刘公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内。该馆所管理的28处甲午战争纪念地历史遗迹,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馆内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标本、档案资料和历史图片,为专题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建馆以来,一直致力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学术研究中心的建设,重视开展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前导,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山东省历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两个学术研究机构,均挂靠该馆,发起并举办了多次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并将中外学者的优秀学术论文结集出版,从而为本丛书的编著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本丛书内含9个分册,各分册分别以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某个重要问题或重大事件为专题,内容既可独立成书,相互之间又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北洋海军建军、海防建设与甲午战争及其前后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就战争整个进程而言,不仅有关于前线海陆战场的生动叙述,还有间谍情报、后勤保障以及日军暴行、人民抗争等侧面展示。丛书的撰著者,大多为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戚其章、王家俭两位先生,在以上领域更有诸多建树,成果甚丰,影响巨大。

若读者不嫌其烦,可由下面的文字中,粗略了解各个分册的书名、撰著者及其主要内容等概貌。

《甲午战争与朝鲜》，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如绘著。该书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日朝关系的叙述，展示日本最终吞并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进行更加疯狂的侵华活动的历史进程。

《甲午日谍秘史》，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戚其章著。该书通过对日本间谍在甲午战前及战争中活动的揭露和分析，认为“在日本准备发动和进行甲午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谍报工作更是起过重大的作用”。

《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由旅居加拿大的北洋海军史著名学者王家俭教授著。作者通过对洋员参与北洋海防建设的史实分析指出：“李鸿章之聘用大批洋员从事国防与军事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国际间的合作与互利。”

《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山东省党校孙占元教授等著。作者认为甲午和战之争同日、美、法等国的政局密切相关，与近代海防和北洋海军的兴衰关系甚为密切。

《甲午中日海战》，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苏小东教授著。该书从军事角度论述了三次海战的起因、经过及其成败得失，既汲取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在史料、观点及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突破，尤其对黄海海战作了全新的评析。

《甲午辽东鏖兵》，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记华、威海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董进一著。该书全景式地叙述了甲午战争辽东战场的四大战役及数十次主要战斗，真实展现了辽东战场的进程、发展、结局与影响。中日史料对照，取舍得当，叙事翔实，评论切实。

《甲午战争在威海》，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威海莹著。笔者聚焦于甲午战争中重要的威海卫之战，资料充实，许多史料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弥足珍贵。同时，该书叙述全面，又不乏独到见解。

《反割台抗日运动》，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柯平副研究员著。本书对日本侵台的全过程以及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主题集中，观点鲜明。它告诉人们，任何势力想要将台湾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甲午日军暴行录》，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苏小东教授著。该书以铁的事实集中揭露、控诉了日军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残酷暴行，说明只有国家富强，才能保障国土和人民的安全。

本丛书集学术性与思想性、史料性与可读性、现实性与开拓性于一体。具体言之，其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吸纳了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在历史研究中更加尊重客观历史现实。如对李鸿章的评价，改变了过去全面否定的结论，给予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既肯定其推进“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海军所发挥的作用，又不能勾销其在甲午战争中因“保船制敌”、指挥不当而丧师失地，以及代表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等历史罪责。丁汝昌亦然。以往人们对他以陆军出身而担任海军提督多有微词。现在实事求是地评价，认为他虽然在海军专业方面存在某些局限，但能够团结年轻的海军将领群体，扬军威国威；在海战中迎战强敌，在最后关头尽职尽责、宁死不降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大节。又如，日本方面有人说甲午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从而成为战争并非“偶然”的致命铁证。如此等等，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第二，在总结和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诸多问题的研究又获突破性进展。如甲午战争前后和战争期间的朝鲜问题、日谍问题、洋员问题、清廷的和战之争、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日本侵华暴行等等。以往的研究虽间有论及者，但均未独立成书，对内涵的挖掘与外延的拓展等，皆有所不及。本丛书则将上述问题分专题独立成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

第三,激浊扬清,高扬民族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北洋海军的覆没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每一个中国人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国耻感。人们在著书立说、纵论甲午时,往往较多注目于国耻,并由此得出奋发图强以雪国耻的激越之论,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军民面对外敌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浴血杀敌、以身殉国、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丛书的《甲午辽东鏖兵》、《甲午战争在威海》、《反割台抗日运动》等分册,将把这一切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四,丛书采用了以事系人的体例,使甲午人物的是非功过凸现得更生动、更真实、更深刻。其中的历史人物置身于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如上层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李鸿章等;陆军的爱国将领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马玉昆、永山等,海军的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义军的丘逢甲、吴汤兴、姜绍祖、徐骧、刘永福等;一般下层士兵王国成等;临阵脱逃将领叶志超、方伯谦等。对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且在甲午战争中有影响的人物,作者没有单独立传,而是将其融入历史事件之中,择要概述并评价之。从而使事与人、人与事有机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人、事一体的历史客观性。

可以说,“勿忘甲午”丛书的推出,既是对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又是把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推向普及的一次大胆尝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本丛书属于探索之作,因此不足或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时贤方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戚俊杰

2004年6月18日于威海

序 二

今年是甲午战争 110 周年。

110 年前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久不衰的重要课题,故长期以来研究者颇不乏人。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甲午战争更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课题,所取得的成绩是斐然可观的。

回顾世纪之交以来的甲午战争研究,我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 25 年,是研究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是研究开创与奠基的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是研究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20 世纪 70 年代迄今,是研究逐步拓宽与深化的阶段。百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对于有关甲午战争的一些原则问题,长期存在着认识上的混乱,有待于澄清。当年日本明治政府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际,即开动宣传机器,声称日清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文明,为了进步”,所以“是一场义战”。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又有人干脆否定战争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说什么“不管什么样的战争,敌方和我方都有各自的正义。某国的正义对其他国家来说也许就是非正义,所以……这些国家做出战争的决定,毋宁说是基于国家利益”。也

有人变换手法,咬定日清战争对日本来说是自卫战争。如称:当时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所谓“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辩解说:“日本为对抗清国而扩军,乃是出于对清国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并非积极地图谋与清国作战”,而是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而进行防战,不是有意识地要发动甲午战争。甚至有人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竟称:“战争中清国的行为十分野蛮,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美洲印第安人如出一辙”,即使如此,“日本在战争中始终如一地忠实地遵守国际法”。对于诸如此类的谬说,要揭露其虚妄,只有靠经过论证的确凿事实才能够廓清其所散布的阴霾,使历史的真相大白于世。

其次,甲午战争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要看到,此项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并存在着不少研究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亟需进一步的探索和填补。从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看,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并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或开阔视野,拓展研究对象的外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转变视角,从新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或从研究对象析出若干重要专题,从微观研究着手,以期在专题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代表作有戴逸、杨东梁教授等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石泉(刘延)教授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 年版)、林子候教授的《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台湾玉山书局 1990 年版)、已故孙克复教授的《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黄秀政教授的《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日本学者井上晴树先生的《旅顺虐杀事件》(东京筑摩书房 1995 年版)等。笔者也先后出版了《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这些著作的出版,无疑会有力地推动甲午战争研究

的发展和深化。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绝不能就此止步不前。要看到还有许多重要的有关专题尚无人涉足,所以前面的路还很长,期待着有志者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复次,在学术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引起相互商榷以至于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是经常发生的现象。甲午战争研究自不能例外。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有通过讨论来解决。真理愈辩愈明。古人云:“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一般说来,通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如对刘步蟾的评价即是如此。长期以来,或根据英籍洋员泰莱(或译戴乐尔,日人译作铁威洛路,William Ferdinand Tyler)的旅华回忆录《中国事记》(Pulling Things in China),断定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表现怯懦,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人物,俨然成为定论。到1977年,有论者提出质疑,引起一场持续数年的激烈讨论。最后认定刘步蟾在海战中指挥努力,表现出色,是值得肯定的爱国将领。此结论终为学术界所接受,并写入历史教科书。

(二)对于某些历史事实,由于论者的立场不同,结论相异,以致引发长期的争论,经过多次交锋,意见始逐渐大致趋同,但仍有小的反复。旅顺大屠杀事件的讨论即其显例。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4天滥杀无辜达2万余人,是为旅顺大屠杀惨案。旅案发生后,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柯文(Thomas Cowen)等竞相报道,举世为之震惊。但日本方面却指责这些报道“夸大其词”,予以否认。百年来两种观点相互对立,论者也是各说各话。近年来随着日本参战者日记的陆续披露,日本史学界才有人对旅案开始进行“正规的研究”,承认了旅顺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但也有论者就一些枝节问题大作文章,如对日军旅顺屠杀的动机、屠杀发生的客观原因、遇害

的身份及人数等问题皆一一论列,既是对惨案的发生进行辩解,也是为减轻甚至借以推脱惨案制造者的责任。尽管讨论正在继续,但无论如何,旅顺大屠杀的基本事实已经铁证如山,是怎样也抹煞不了的。

(三)也有一些看起来似乎确凿无误的历史事实,不觉得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却突然发现这些历史事实并不简单,其背后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重要情节,必须提出来展开讨论。如甲午战争赔款问题即是这样。《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还订有《另约》,规定日本在威海卫的驻军费由中国支付,每年(共计3年)库平银50万两;其后又签订《辽南条约》,规定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回辽南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为库平银2.315亿两。这本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的事实,历来中外研究者都认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从无人提出过任何质疑。当然,这也无足为怪,因为研究者所看到的只是纸面上的条约文字,而无从实际了解中日双方议付赔款时的具体交涉和操作过程,故而不可能知道其中还另有文章。近几年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查到了日本公使林董致总理衙门的信函,其中提出中国交付赔款的办法:一是以“库平足色”为名,由日方定库平成色标准,变相地多勒索库平银1325万两;一是要求用英镑在伦敦支付赔款,也由日方定镑银折价标准,又变相地多勒索库平银1494万两。这样,中国的实际赔款数不是人们熟知的2.315亿两,而是2.5969亿两。一些本来明确无误的定论发生动摇,又得出了新的结论,这标志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在发展,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四)长期争论未决的疑案一朝尘埃落地。如日本军舰冒挂第三国舰旗问题可谓适例。战争期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国或升法旗”。对此,时人姚锡光信而不疑,在所著《东方兵事

纪略》还指出日舰冒挂美旗之事。但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这仅是中国方面的一面之词,孤证不立,因而采取审慎的态度,不予引用。职是之故,这成了一桩延续百年的疑案。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案之谜。这部由日本海军军令部主持编写的未刊稿,几次提到日舰冒挂第三国旗帜事。如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至此,中日文献相互印证,疑案终可办成铁案了。

上述诸种情况充分表明,甲午战争研究确实是大有潜力可挖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资料整理工作得到加强,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和使用的条件。记得听李侃先生说,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评价极高,赞不绝口,告诉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说,《丛刊》的出版为美国培养了200名历史学博士。并建议继续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如今,作为《丛刊续编》之一种的《中日战争》12册,业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齐了。相信这套文献资料书籍的问世,必可有力地推动甲午战争研究工作的发展。借着这股东风,并基于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现状的分析,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决定推出“勿忘甲午”工程,此正其时矣。

作为“勿忘甲午”工程的参与者,我有机会通读了全部书稿,得以先睹为快,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我觉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力图做到三个统一:

其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所谓宏观研究,是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在与历史全局的总联系中进行考察,并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实即对这一研究方法的朴素表述。他又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则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历史的全局是由一系列历

史的局部或细节所构成,所以就考察的范围而论,宏观研究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全局,而微观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历史的局部。但是,偏重纯粹的宏观研究,所论极易流于空疏,难以切合历史实际;相反,偏重纯粹的微观研究,所论又极易陷于片面,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有鉴于此,本书力求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因此,本书在拟定其论述的内容时便开阔视野,拓宽研究的领域,然后将与本课题相联系的专题进行排比,选择其中重要者作为书中的分题。这样,不但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研究对象的全体,而且还能够对各个分题进行过细而深入的研究。现在看,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分题的研究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些分题的研究则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就是最好的明证。

其二,史与论的统一。关于史与论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曾有过多种解答。这里所说的史是指史料,论指由史料引出的论点或结论。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史与论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史与论的矛盾运动,便贯穿于这个过程的始终。占有史料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辨析史料标志着研究的开始,然后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就是从史到论。但是,已经得出的结论需要表述出来,就得选择典型的史料进行论证,这就是从论到史。从史到论,又从论到史,便构成了整个的历史研究过程。我曾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一过程:论从史出,史为论证。不过,无论怎样,史都是第一性的东西。“勿忘甲午”可以说是较好地处理了史与论的关系。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而又论证严密,确为本书的独到之处。特别是某些分题对新资料的挖掘下了极大的气力,并且在本书中首次发表,使之生色不少,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对于历史著作来说,一般起码应具备两点:一是知识性;一是学术性。所谓知识性,就是所叙述的内容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就是说,所言必有据,叙事必有本,皆确凿可信,堪称信史者。这就是求真。但仅仅做到了求真,

显然还是不够的。由于新的史料不断出现,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要求研究者在学术上也应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将学术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就是创新。在求真的前提下创新,才可做到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勿忘甲午》不仅在求真方面下了功夫,使之成为大家可以放心阅读的信史,而且时有创见,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所有这些,才构成了书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以上所述,既是本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之所在。我相信,“勿忘甲午”的出版,必定会得到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这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戚其章

甲申仲春于山东社会科学院

前 言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是以实行对外军事扩张为基本国策。其侵略矛头首先是指向中国。日本的每一次对外军事侵略活动,都是以派遣间谍搜集情报为先行的。在日本准备发动和进行甲午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谍报工作更是起过重大的作用。

人类社会自发生战争以来,就有了间谍。从古到今,军事集团与军事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要有战争发生,除了一幕幕刀光剑影的鏖战场景之外,最扣人心弦的恐怕要属敌对双方的幕后策划和间谍活动了。美国间谍史作家埃德温·马勒指出:“古埃及人就拥有过组织得很严密的间谍队伍。摩西把约书亚派到迦南城去窥探当地的虚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由于在西班牙宫廷里安插了告密者,事先就获悉了无敌舰队的征战计谋。拿破仑宣称,一个好的间谍抵得上战场上两万名士兵。从乔治·华盛顿的时代起,美国在战争时期曾经常巧妙地使用了间谍和反间谍的手段。”^[1]这里说的是使用间谍的普遍性。

日本的谍报工作,滥觞于德川幕府时期。当时,幕府曾豢养三百多名密探,派往全国各处,以侦探诸侯的动静。这些密探称作“庭番士”,其义近于“侍卫”,可以直接谒见将军,面陈由各诸侯方面所得到的情报,所以将军虽高踞府邸之中,但对于诸侯间的一切意图和动态,却都能了如指掌,应付裕如^[2]。这些密探叫作“忍者”或“隐者”,意即“武技高超,行动飘忽,来去无踪并从事间谍活动的